



# 巾帼英雄张景文:用热血和柔情书写壮丽史诗

在陕甘边这片充满热血与激情的土地上,曾经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而张景文便是其中一位杰出的女性代表。张景文,又名静雯,曾用名秀云,陕西蓝田人。

1906年,张景文出生于蓝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1924年,她进入陕西省教会学校就读。1928年,考入陕西省立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并担任学生队长。在当时进步思想的熏染之下,张景文踊跃地投身于革命事业,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她的引领之下,堂弟张少堂、侄子张吉民亦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1932年4月26日,国民党极右分子戴季陶在西安民乐园各校师生大会上上进行反共卖国宣传,激起广大师生义愤,张景文带领同学当场痛打戴季陶,遭当局逮捕关押,后经中共组织及各界进步力量营救获释,但被学校开除。张景文带头痛打戴季陶的英勇举动,在西安一时被传为佳话,她也因此成为西安学生运动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之一。

1933年冬,刘志丹等率领红二十六军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随后,许多革命青年纷纷奔赴南梁革命根据地,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就是张景文夫妇。

1934年春,张景文和丈夫徐国连

为了寻求革命真理,秘密携带为红军搞到的枪支,撒下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不畏艰险,来到陕甘边苏区——南梁革命根据地(今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南梁乡)。当时的南梁革命根据地,正值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根据地奇缺文化人才。张景文夫妇到南梁后,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人人格器重,分配他们做宣传工作。他们晚上编写宣传资料,创作革命歌曲,白天刷写宣传标语,走村串户,广泛宣传革命道理,鼓励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张景文更是女中豪杰,能双手同时挥毫,被人们誉为“军中才女”。

1934年11月,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上,代表们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出席大会的100多名代表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以习仲勋为首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推选高敏珍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不久之后,张景文接任妇女委员长。

张景文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期间,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她把革命故事自编自唱成信天游,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带领开展妇女工作,宣传婚姻自由,开展妇女放足,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和工作。在她的引导下,白马庙的惠长英、牛望台的贾朝英、荔园堡的王继兰等南梁妇女纷纷走出家门参加革命工作。

同年,为了发展陕甘边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习仲勋亲自发动群众在南梁荔园堡的转咀子办起了陕甘边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并派张景文和高敏珍、郝建德等担任列宁小学教师。

此时,列宁小学的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仅有两栋房屋与一孔窑洞充作教室。张景文引领着60余名学生,亲自动手垒土台当作凳子,架起木板当作桌子,从而化解了没有桌凳的难题。而且,他还亲自编写教材,采用诗歌或者顺口溜的形式,让教材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学习和记忆。例如,教材中有一段的开头两句便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

在南梁山区,入学的孩子大多十三四岁。张景文对这些孩子关怀备至,衣裳破损,她便亲手一针一线地缝补;小脸小手脏了,她就一把一把地为孩子们洗净;甚至当孩子们身上生了虱子,她也会坐在油灯下,一个一个地将其抓掉。孩子们对张景文既喜爱又敬重,同时张景文也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1935年3月,张景文的爱人徐国连

奉命回西安购置武器,途经宜君县小

石崖时,不幸被反动民团杀害,壮烈牺牲。张景文化悲痛为力量,以更高的革命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

1935年4月,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陕甘宁晋绥十几万兵力,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陕甘边红军被迫撤离南梁地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随之迁到陕西甘泉的洛河川。列宁小学停课,张景文跟随苏维埃政府机关来到洛河川后,依旧投身于妇女工作。她性格活泼开朗,逢人便笑语相迎。平日常,她光着脚丫穿着一双黑方口偏带鞋,到群众家里去时,光着脚板就盘腿坐在炕上。群众和游击队的队员们都喜欢同她打趣,称她为“张放心”。

同年秋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生错误肃反,张景文被诬陷为白区来的“奸细”,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来之前受迫害致死,时年29岁。

2000年,习仲勋、齐心夫妇捐款修建的甘肃省南梁列宁小学教学楼落成后,习仲勋题名“景文楼”,以张景文烈士的名字命名,学校院内正中竖立着张景文的铜像。

张景文是众多革命女性的一个缩影,她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巾帼英雄,用热血和柔情书写壮丽史诗。

(据《民主协商报》)

# “黄埔巾帼豪杰”——钟复光

钟复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组建中国妇女界联合会,1926年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大队政治指导员,1945年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监事。

## 走上革命道路

1919年,16岁的钟复光考入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五四浪潮卷来,她带领青春少女与其他学校的学生联合,冲出课堂,走上街头,发传单、作演讲,每次宣传她都走在前面,带头喊口号,带头剪辫子。她从同学处悄悄借来《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如饥似渴地阅读。

1921年暑期,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陈愚生等举办了一次“夏令讲学会”,聘请邓中夏、王德熙等讲课。钟复光参加了这次学习,与邓中夏老师接触最多。

在邓中夏老师帮助下,钟复光去到繁华而喧嚣的上海,考入上海大学。学校办学方针是“培养建国人才”,来自五湖四海的学生都是研究革命理论、准备献身革命的有志青年。她读社会学系,系主任是瞿秋白,很多教授都是革命前辈和德高望重的人士,如张太雷、蒋光慈、施存统、李季、李达、周建人、蔡和森、萧楚女、恽代英等。

在上海,钟复光住在兴业里1号党组织妇女部部长向警予家里。她很敬

重崇拜向警予,称向警予为“大姐”。不久,毛泽东和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去到上海住在向警予楼上,钟复光与他们成为了邻居。后来钟复光搬到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与萧楚女成了邻居。邓中夏和恽代英在这里编印《中国青年》,钟复光做编务。

1924年秋,钟复光牵头组建女界国联会议促成会。在向警予的领导下,她联络妇女界的同志进行大量的宣传工作,起草相关的文件和宣传资料,向广大群众进行推翻军阀统治的宣传教育活动。钟复光经向警予和邓中夏的介绍,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 “复光复亮 宗旨一样”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钟复光接到全国学联总会的通知,安排她沿长江上溯,到各城市组织群众集会,宣传革命,揭露帝国主义暴行,向商界募捐接济上海罢工的工人。她先后到了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武汉、长沙、宜昌、沙市、重庆等大中城市。每到一地方,她就组织当地的学生会和妇女界召开大会。她在大会上进行演讲,由于演讲过多,过于激动,以致痰中带血。中秋节,钟复光完成任务回到学校。但到了冬季,她又出现吐血,不得不住进医院治疗。

这时,一个人闯进了钟复光的感情世界里,他是施存统,是她最为敬重

的老师之一,知名学者和中国青年运动早期领袖。1926年春天,二人结为革命伴侣。两人高尚纯洁的爱情与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当时就被传为佳话。

在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陈列着一张1946年“重庆市市民医院处方笺”,记载着“施复亮门诊号41099,颈部与右臂部挫伤,特此证明”。这是施存统(即施复亮)在较场口事件中被打伤的伤情报告。1946年2月10日,施存统惨遭国民党特务毒打以致脑震荡。

## 担任黄埔军校教导员

1925年,黄埔军校成立。1926年,军校开办女生队。这是史上唯一的一期女生队,被列为军校第6期。1927年2月,党组织安排钟复光担任女生队的教导员,直接负责女生队的训练管理工作。之后,中央军校学生与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由恽代英任党代表,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

钟复光忠于职守、思想进步、为人正派、平易近人,非常关心体贴青年教师。她在校内精心组织“读书会”,鼓励教师看《新华日报》,引领他们追寻正确的人生道路,教师学生都乐于接受她的指导和影响。许多人成长为中国第一批女军官,涌现出大批巾帼英豪,包括抗日英雄赵一曼、著名红军

女将胡筠、聂荣臻夫人张瑞华、徐向前夫人黄杰等。女生队的建立,在中国妇运史上也写下了光辉一页,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原女生队学员、著名作家谢冰莹回忆说:“我们200多名娘子军,要求和男兵一样,全副武装起来,持枪杀敌,与男兵并肩作战。”钟复光等人带领女生队,沿途张贴标语,向群众宣传“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大众的”。

## 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

1945年9月5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妇女联谊会人士。当毛泽东和钟复光握手时,钟复光小心而又紧张地像别人一样自报家门:“主席,您好!我是钟复光。”毛泽东端详着她,眼里充满关切地问:“存统好吗?”听到毛泽东问候丈夫,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忍住激动的眼泪,忙回答:“好!好!”

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钟复光当选监事。民建重庆市委会组织处原处长钟守诚后来回忆:钟复光任重庆江北中兴实业小学校长时,介绍钟守诚等5人加入民建,建立了民建小组。

新中国成立后,钟复光历任全国妇联第五届执委,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据《人民政协报》)

## 冷遁题写“潞国精神”匾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民政长、安徽省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省省长、江苏督军、抗日民主政权苏北参政会名誉议长。海安沦陷后拒任伪职,终因积愤成疾去世。时任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誉为“民族抗战之楷模”。

“镇江三老”之一的冷遁是民盟、民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创始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建江苏工委主委等职。

冷遁与韩国钧交谊深厚。《朋僚函札》收录了1915年至1937年间,韩国钧与康有为、梁启超、黄炎培等人交往的信函,共计57册3600余件,其中收录了《冷遁致韩国钧的五封信》。

1922年至1925年,韩国钧任江苏省省长,一度兼任江苏督军。为医治战争创伤,平定南京及维护其近郊社会稳定,韩国钧作了艰苦的努力,斡旋于军阀派系之间,减少军事纷争;筹设赈抚局,恢复市面经营;组织初、高等学校复课;筹设江南水利局,开浚秦淮河,勘视白茆河,设立江北运河工程局;参与中山陵的选址、初建筹备工作。

1925年1月,张宗昌部南下江苏,为免江苏生灵涂炭,韩国钧特委冷遁为江苏全省水陆警备总司令。1913年3月,冷遁时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张宗昌经柏文蔚、陈英士介绍至第三师,冷遁任之为骑兵第三团团长。冷遁是张宗昌的“老上司”,韩国钧可谓是知人善用。

1926年,韩国钧70岁寿辰之际,冷遁题赠“紫石先生七秩荣膺 潞国精神”匾额,褒赞韩国钧主政江苏期间有不凡建树,且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该匾现悬挂于海安韩国钧故居内。文人多以“潞国精神”来赞誉某些有建树且精神状态良好的人,如清代袁枚的诗句“夜深官鼓响冬冬(咚咚),潞国精神少倦容”。

(据《人民政协报》)

## 朱元璋打板子正文风

明太祖朱元璋(1368年—1398年)是一位以勤政著称的开国皇帝,为了有利于集权治理,他罢废了丞相和中书省,提升六部的职权,大大小小的政务,都要亲自处理。

批阅奏章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忙到深夜也处理不完。有些官员写奏章不讲章法,拖沓冗长。后来,刑部主事茹太素的一封信,成为朱元璋改革奏疏格式正文风的直接诱因。

据明《礼部志稿》载:洪武九年(1376年),茹太素上了一份万言书,明太祖让人读到6000多字,还没有听到具体意见,不由大发雷霆,令人将茹太素打了一顿板子。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着读,读到1.6万多字以后,才涉及到本题,建议5件事,其中有4件事可行,朱元璋即刻命令主管部门去办。这最后几百字可以说清楚的事,不仅使人听后如坠云雾,难明其意,而且阅读需耗费大量时间,严重影响处理奏章的进度。为此,朱元璋把这件事的经过写成文章公告天下,从此规定了《建言格式》:“洪武九年,朕见灾异万端,余无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许言朕过。是以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1.7万字,朕命中书郎王敏立而诵之,至字6370……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1.65万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500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著迹以行……因如是,故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

经过一番整顿以后,大臣再上奏章就简略多了,大都只写实事。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七年9月间,从14日到21日,8天内,共处理内外诸司札凡1660件,计3391件奏。这样一来,朱元璋平均每天能看或听200多件奏疏,处理400多件事。朱元璋从中央做起,改革的奏疏文风大见成效。(据《联合日报》)

## 严守公私界限的张元济

张元济是现代著名出版家,曾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职,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敬的是,他虽然身居要职,却不假公济私,一直严守公私界限,为公众树立了一个清廉的榜样。

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曾在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23年至1925年的两年半为商务营业最旺盛时代,董事会屡次研究讨论投资问题。夏鹏(董事)提议在南京路最佳地段购地建屋。各方探听,得悉一家英商经营房地产业的洋行有一地愿售。董事会委托父亲去该洋行询问地价和购买手续,由洋行英籍经理接待,提出的条件是地价30万两,绝不削价,必须签订买卖合同,限一星期付款,逾期不付清,每天以地价千分之一,即3000两计算违约金。父亲立即回公司详告董事会。董事会认为黄金地段,此价不算高,且公司财力绰绰有余,遂即通过,并指定由父亲出面签订合同。不料翌日高翰卿(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提出反对意见,几经磋商,高竟寸步不让。合同期限将到,每天3000两罚金不能出账,怎么办?父亲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办法:找一个姓张的去顶替。找谁呢?他很快想到一位,南浔大富翁张瀚如。父亲拜访,讲明来意,张瀚如想这样的好买卖竟会送上门来,何乐而不为。”于是,张瀚如接盘了这个买卖,不到三个月,地价上涨到60万,张瀚如转手卖出。

其实,在这笔买卖上,张元济如果动一点私心,他也跟着发大财了。因为当初张元济找张瀚如商谈这件事的时候,张瀚如提出愿意与张元济合股经营,但张元济谢绝了他的好意。

张元济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拒绝送到嘴边的大蛋糕呢?原因是他拥有着公私分明的境界,张树年在书中写道:“更重要的是父亲认为他是代表商务签约,而非个人行为。利用这样的机会赚钱,岂非假公济私、变相贪污。”

(据《联谊报》)



一名战士在“坚决保卫四平”的标语前站岗。(资料图片)

1947年,国共双方在东北发生劣势势转换的关键是四平战役。当时解放军没有重武器,为了攻破蒋军的美式坚固防御,三战四平中发明了“四组一队”战术。所谓“四组一队”,就是由火力组、梯子组、爆破组、突击组,组成1个突击队,相当于1个排的兵力,下面有4个班。

这个战术在部队推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战士们对战后评定功勋的做法有些意见。原因是虽然东北民主联军公布了立功条例,但是战后能立功的,不一定是那些在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的人。尤其是牺牲的,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挫伤了战士的积极性。

时任55团政治处主任在一线部队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就发明了“合同立功”法。所谓“合同立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挂帅点将。在一个连队里先确定3个突击队长预选对象,然后给全连每个战士发一颗黄豆,让大家在3个对象背后的土碗里扔豆子,最后数谁的豆子多谁当选。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当时扩展很快,吸收了大量解放战士。所谓解放战士就是俘虏兵,给他们在称呼上以尊重,说你只是解放得晚了一点,所以叫解放战士。这些解放战士有的是在回家路上又被国民党军抓壮丁,被我军二次俘虏的,叫“二进宫”。而“二进宫”的解放战士往往在连队里被大家看不起,被认为阶级觉悟差。他们自认为得不到领导信任,政治上也不求进步。由于搞了这种挂帅点将的选举,“二进宫”的解放战士往往当选。因为他们已经在有了几出几进的经验,对国共双方军队都了解。战士们认为他们战术好,枪打得准,跟着他们能打胜仗。战士们是拿命来投票的,所以他们往往能当选为突击队长。士为知己者死,“二进宫”的解放战士自尊心大增,积极性高涨。连里举行盛大的授旗仪式,一个大红旗上面写着“帅”字,由连长亲自授给被选上的突击队长。然后这个“大师”再选出他的“四大将”,就是4个组长,各组再选自己的组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充分信任的“梦之队”。

第二阶段,分组操练。挂帅点将阶段结束,接下来是在一个与敌人阵地相

似的地形上,修一个模拟阵地,让这“四组一队”反复在上面操练,一直练到有肌肉记忆为止。他们的配合达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即使是在炮火连天、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能做到跑不错路,送不错位置,炸得准、打得狠。这个阶段叫“艺高人胆大”。

第三阶段,签订“生死合同”。“生死合同”不是领导和战士签,而是战士和战士签,火力组跟梯子组签。合同上写着:冲击发起后,你只要用机枪压制1号碉堡,让它5分钟内打不出枪来,我就有义务给你请功。你活着就是大功一件,你死了就是烈士。当时立功条例明文规定:如果是烈士,地方政府一次拨付5000斤高粱米。按当时的消费水平算,足够这个家庭吃10年。老人可以送终,孩子可以养大,这样就导致了所有的战士在战场上奋勇争先。因为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往往是机枪射手,以往最缺的也是机枪射手,现在“合同立功”使所有人都想当这个机枪射手。

这个合同是一环扣一环的。梯子组跟爆破组签,爆破组跟突击组签,突击组跟红旗手签,红旗手跟连长签,形成了一个递进的链条,所有战士的诉求都是链条中的一环。他们互相之间有监督作用,谁都不可能在里面打马虎眼。

“合同立功”这个方法被运用在了第四次攻打四平的战斗中。有个队长

是“二进宫”的解放战士,希望通过这次战斗能入党。战斗发起之前,他第一个冲上阵地去看地形。当时那座碉堡只能容下4个人,他嫌碉堡观察孔太小看不清,就自己跑到外边去看。连长说,你不要命了!他说,我担负了一个突击队的责任,如果我不清楚那,那所有的战士都完成不了任务,所以我必须看清楚。

第四次攻打四平的战斗,上级提前发起了攻击。由于头一天晚上战士们吃了大餐,闹肚子。早晨攻击之前,突击队长正在草从里方便,一看信号弹腾空而起,提起裤子就往前面跑,夹起个炸药包就上去了。跑了一半裤子掉了,他仰面朝天系裤带。第二爆破手在后面看到,说:“坏了,‘大师’挂了,我得上!”第二爆破手就爬到他的跟前。这个队长说:“你为什么上来,我这不挺好的吗?”“你脸朝上,谁知道你好好好的呀?脸朝上不就是挂花了嘛!”他说:“你等着,我给你炸。”他一个翻身就上去了,原本计划走右边,到前面一看,发现右边是两道铁丝网,而左边只有一道铁丝网,于是临时改变计划。15分钟突破,无一伤亡,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合同立功”的方法被第7纵队政治部主任袁升平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批准推广到所有纵队,使得部队战斗力大增。(据《中国组织人事报》)